



华侨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哲学系列
HUAQIAO UNIVERSITY

文库主编：贾益民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 及其话语路径研究

*A STUDY ON ANTONIO GRAMSCI'S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AND ITS DISCOURSE PATHS*

叶惠珍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华侨大学
HUAQIAO UNIVERSITY

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哲学系列

文库主编：贾益民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 及其话语路径研究

*A STUDY ON ANTONIO GRAMSCI'S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AND ITS DISCOURSE PATHS*

叶惠珍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话语路径研究 / 叶惠珍

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1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哲学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9768 - 6

I. ①葛… II. ①叶… III. ①葛兰西(Gramsci,

Antonio 1891 - 1937) - 领导权 - 政治思想 - 研究 IV.

①D095.4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5227 号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哲学系列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话语路径研究

著 者 / 叶惠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刘 荣

责任编辑 / 周 琼 钱越洋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768 - 6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贾益民

副主编 曾 路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生	王四达	王丽霞	庄国土	许少波	许斗斗	许培源
孙 锐	孙汝建	孙德明	李拉亚	李景源	宋振镇	张向前
张禹东	陈旋波	林怀艺	周世兴	郑向敏	郑锦扬	赵昕东
胡日东	胡培安	骆克任	贾益民	郭克莎	黄小萍	黄远水
梁 宁	程一辉	曾 路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总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构建人类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积极成果有助于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价值。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此，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对于推进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作用。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全面部署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各项工作，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高等学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因此，高校有责任担负起繁荣哲学社会科

学的使命,激发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环境,致力于打造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精品力作。

华侨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华侨高等学府,也是中国面向海外开展华文教育的重要基地,办学55年以来,始终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秉承“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贯彻“会通中外,并育德才”的办学理念,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之路、特色兴校之路、人才强校之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致力于建设基础雄厚、特色鲜明、海内外著名的高水平大学。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时期,华侨大学敏锐洞察和把握发展机遇,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一方面,华侨大学扎根侨校土壤,牢记侨校使命,坚持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彰显独特个性。“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是华侨大学的办学宗旨与神圣使命,其办学活动及其成果直接服务于国家侨务工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华侨大学积极承担涉侨研究,整合、利用优势资源,努力打造具有侨校特色的新型智库,在海外华文教育、侨务理论、侨务政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外华人社团、侨务公共外交、华商研究、海外宗教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形成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推出了以《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世界华文教育年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另一方面,华侨大学紧紧抓住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机遇,积极响应教育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部署,颁布实施《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为今后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发展纲领与制度保证。该计划明确了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即紧抓国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机遇,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发挥综合大学和侨校优势,通过若干年努力,使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方向更加凝练,优势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平台更加坚实;形成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具有国家竞争力的高水平学术队伍;研究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服务国家侨务工作的能力明显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水平不断提高,适应文化建设新要求、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作用更加凸显;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国际文化对话与传播能力进一步增强。到2020年,力争使华侨大学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文化传承与知识创新高地,国家侨务工作的核心智库,提供社会服务、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重要阵地。

为切实有效落实《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学校先后启动了“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专项资助计划”“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专项资助计划”“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百名优秀学者培育计划”“华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培育与发展计划”五大计划,并制定了相应的文件保证计划的有效实施,切实推进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专项资助计划”作为《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的重要配套子计划,旨在产出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高水平原创性研究成果,打造学术精品力作。作为此资助计划的重要成果——《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将陆续推出一批具有相当学术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凝聚着华大文科学者的心力、心气与智慧:他们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他们以国际视野为基础,不断探索开拓学术研究领域;他们以学术精品为目标,积聚多年的研判与思考。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按学科门类划分系列,共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八个系列,内容涵盖哲学、应用经济、法学、国际政治、华商研究、旅游管理、依法治国、中华文化研究、海外华文教育等基础理论与特色研究,其选题紧跟时代问题和人民需求,瞄准学术前沿,致力于解决国家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困境,其成果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国家侨务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国家华文教育事业与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可以说,该文库的打造是华侨大学展示自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创造力、价值引领力,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次大胆尝试。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已经实施近两年,经过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华侨大学的文科整体实力正在逐步提升,一大

批高水平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一批高级别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奖成功获评。作为华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集中反映了当前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充分发挥了优秀学者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展示了青年学者的学术爆发力和创造力，必将鼓励和带动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教师以闽南地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与斗志，不断营造积极向上、勇攀高峰的学术氛围，努力打造更多造福于国家与人民的精品力作。

当然，由于华侨大学面临的历史和现实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以及华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视野与学术积累的局限性，《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在研究水平、研究方法等方面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在此真诚地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付梓，为即将迎来 55 岁华诞的华侨大学献礼！让我们一起祝福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蒸蒸日上！让我们以更大的决心、更宽广的视野、更精心的设计、更有效的措施、更优质的服务，培育华大社科的繁花硕果，以点滴江河的态势，加速推进华侨大学建设成基础雄厚、特色鲜明、海内外著名的高水平大学，更好地服务海外华侨华人，支持国家侨务工作，配合国家发展战略！

华侨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益民

2015 年 4 月 28 日于华园

摘 要

葛兰西以二分维度双向诠释 hegemony（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既披露了以常识为外衣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之隐蔽性，同时又构想了霸权的反向维度，即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现实生成路径。在葛兰西看来，意共低估了法西斯文化霸权的思想侵蚀力，而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力量薄弱，对内无法凝聚意共党员的共同革命意志，对外不愿与其他阶层积极联合，无法有效团结大众，因而导致了最终的溃败，痛失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怎样才能对抗资产阶级乃至法西斯文化霸权？葛兰西的答案是培育共产党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采取在市民社会的教育、传媒、宗教、生产机构等多个阵地里进行“阵地战”的隐蔽文化战争模式，凝聚广大民众的集体意识和革命意志，最大限度地接合不同阶层的利益需求，尽最大可能赢得广大工农群众对于共产党的积极认同，培育党的文化领导权，对抗资产阶级文化霸权。

葛兰西的理论设想并非完美。他过度强调文化、意识形态，在不自觉间陷入一种立场游移的唯心/唯物主义。他所设想的阵地战策略也有一定的空想性质，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有机知识分子群体身上体现了一种精英主义思维，暴露出他对大众革命主体地位的轻视。事实上，葛兰西的理论更适用于已经获得政权、需要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执政党。对于尚未获得政权的政党而言，这个理论则过于理想化。

瑕不掩瑜，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葛兰西在教条主义、宿命论大行其道的 20 世纪 30 年代以卓越的批判精神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开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先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第一，他从文化视角展开对领导权的研究，促成了领导权建设的立体化和完整化，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论域。第二，葛兰西充分肯定“意识形态”的积极物质性力量，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虚假意识形态”的单纯负面批判，促使无产阶级政党有意识地构造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借此链接不同利益阶层，发挥现实的物质力量。第三，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向市民社会延伸的根本变化，在资本主义向福特主义演变的重要节点上适时地革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国家观，赋予市民社会以及阵地战策略显著的领导权建设意义。第四，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承载了“劳动群众—专业技术精英—科学技术专家—有机知识分子”之间的跨阶层身份链接，回归生活生产世界寻找智识领导权的源发路径，以层递方式阐明了劳动群众与智识先锋集团之间相辅相成的共生逻辑。第五，葛兰西对于阶级联盟的强调体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现实出发、不迷信教条、不盲从权威，敢于直面现实矛盾、独立判断、大胆批判的革命勇气和思想深度。第六，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适用对象拓展到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而不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政权分析。这种扩展突破了固步自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给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深刻启发，杜绝了对于“命定的”社会变革的盲目期待，促使人们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找夺取领导权的切实路径。

但是，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与巩固不能仅仅遵循从文化到文化的形而上学路线。它受到经济、政治、军事和话语领导权的联动支撑，各种权力立面相互制掣、相互依托。无产阶级政党要获取、巩固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必须营造强大的话语网络，强化言说能力，生产并推广切合大众政治心理需求、能够影响大众政治判断的价值话语，消解资本主义话语逻辑。

在葛兰西之后，哈贝马斯试图论证如何通过程序性的话语生产、话语协商来形成公允的法律，实现社会团结，形成社会共识。但是他的话语伦理学是一条历经“理性—道德共识—主体间性—公正话语—交往理性—社会规范”的封闭式自我循环链，以过度乐观的个体理性、集体理性预设为出发点。此外，他的思想隐含精英主义交际主体观，忽视了话语弱势

群体的话语资格困境。

拉克劳与墨菲也把话语作为一种孕育文化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在他们看来,文化领导权建设是一种在开放性空间中培育“话语等同链”的过程,话语符号作为“漂移的能指”,为话语溢出、话语场扩大和话语接合创造了弥合空间,是左翼政党链接不同政治立场的泛“普遍性”前提。但是,拉克劳与墨菲抹杀了阶级存在的事实和经济要素的作用,片面夸大了话语的建构功能,曲解了葛兰西思想。

本书同样以话语为切入点,尝试性地提出了“WWWH 话语领导权理论”,试图从话语主体、内容、场域和策略维度构建政党与大众共享政治话语权、巩固文化领导权的现实路径。所谓话语主体(Who)包括以抽象主体性、话语实践连贯性为特征的领导集团,作为边界守护人的领导中介(有机知识分子)和以话语资格和话语动力为主体性生成前提的被领导者(大众)。话语内容(What)因话语主体身份而有所不同,领导集团话语有内政、外交话语之分,领导中介在面对执政者、大众和“无机知识分子”时话语内容也有所区别。大众政治话语则应该以表达、抗议、监督、选择为主题。话语场域(Where)包括传统媒体话语场和新媒体话语场。在传统媒体话语场,领导集团需注意“搭场”“割地”,以“个人署名”的方式传播执政话语。在新媒体话语场,执政者则需要积极驾驭各种新型话语渠道,以开放姿态对话大众。话语策略(How)也因主体身份有所区分:执政者需注意评价性多声词汇以及人称代词的使用,领导中介与被领导者则要充分利用明喻、隐喻、双关、委婉语等各种话语修辞。

为检验 WWWH 话语领导权理论的适用性,本书以中国政府“互不干涉内政”话语和瑞士政府“中立”话语为例,比较分析话语主体地位、话语内容、话语场域开发程度与话语策略使用情况分别对两国政府的国际文化领导权有何影响。分析结果为,中国政府在“互不干涉内政”话语的对外言说过程中国家身份言说不足,对于国际政治“潜规则”的解构力度不够,在话语内容维度上先逊一筹。就话语主体地位而言,中国政府较好地保持了抽象主体性与话语连贯性,但是作为重要话语主体的中国有机知识分子由于话语资格与话语动力问题在国际话语场上“失声”现象严重。中国政府当前正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两个方面着手开拓国际话语场

域,但是话语能见度仍然不高,尤其在自主话语平台“搭场”、领导者“个人署名”式发言以及多形式新媒体应用上还有待提高。在话语策略方面,中国政府注意使用“收缩性多声”,却忽略了“扩展性多声”的使用;大量使用“我们、他们”,但仍然不习惯使用“你、我”的短距离人称代词。由于在话语主体、内容、场域和策略维度上都有所不足,中国政府的国际话语领导权受到较大影响。

对照瑞士案例,在话语内容方面,“中立”话语折射出国家身份断裂与瑞士政府隐蔽破坏国际规则的问题。就话语主体性而言,瑞士政府保持了抽象主体性和话语连贯性,但是言行不一,凸显了原 WWWH 理论中“话语连贯性”规范的解释力不足,应改为“话语与实践连贯性”。作为话语主体,瑞士有机知识分子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无机”知识分子。瑞士大众具有话语资格和话语动力的双重主体性保证,但仍然无益于国家文化形象,暴露出原 WWWH 话语理论的另一个不足,即大众“话语辨别力”维度的缺乏。瑞士政府忽略了英语国际媒体,且忽略了“扩展性多声”策略,人称代词的使用比较呆板。对 WWWH 四维的忽视进一步损害了瑞士国际形象,致使其国际话语权微弱,文化领导权无从谈起。

最后,本书进一步探讨了政党或政府在获得文化领导权之后还需要防范的文化领导权之三重异化的可能性。如果一味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忽略市民社会建设,那么该政治集团的核心政治思想就无法穿越“反霸权边界”(CHB),只能导致文化领导权异化为独裁霸权,最后被其他先进政党夺取文化领导权。我们把这种异化称之为文化领导权的第一重异化。

反之,如果“执政党—强制性国家机器—市民社会机构—个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传播链条得到良性衔接,执政党有可能获得阶段性的文化领导权,此时 CHB 会自然遁形,收缩为半开放的“防御性理性边界”(PRB)。PRB 介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以权力理性和文化理性为戒尺,双向防御可能来自政治社会的独裁霸权以及来自市民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乱象,避免文化领导权的第二重异化。

在国际政治文化交往中,为了避免文化领导权的第三重异化,还必须强化“反吞噬二重边界”(ADBs)的防御作用,避免霸权国家对于他国的文化领导权吞噬。ADBs 包括“大众认同”的第一重反吞噬边界

(ADB1) 和“良性政治社会建设”的第二重反吞噬边界 (ADB2), 两者共同确保了本国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与外国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交往的过程中不至于流失国家文化特质、丧失政治交往身份。从 CHB 到 PRB 再到 ADBs 的三个阶段构成了本书的“弹性边界三阶论”, 该理论是一个探索如何防范文化领导权异化的三阶理论, 是在国际交往语境中对葛兰西思想的一种尝试性延展。

综上所述, 本书沿着“走近葛兰西、辨析葛兰西、走出葛兰西”的理论路径, 在葛兰西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延展, 尝试性提出了“WWWH 话语领导权”理论和“弹性边界三阶论”, 并结合中瑞外交话语实践的对比提出了策略性建议。笔者在当代国际交往语境中引入葛兰西思想, 是一种“西为中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尝试, 力求为当代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参考。

Abstract

Gramsci's interpretation of hegemony is based on the dialectic dynamics between cultural hegemony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aiming at revealing the deceptive capitalist cultural hegemony in disguise of common sense, leading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proletariats' cultural leadership. To Gramsci, it was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s (ICP) underestimation of the erosive influences of fascist cultural hegemony which led to its consequent loss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hegemony.

How can a communist party fight against capitalist cultural hegemony? The answer provided by Gramsci is to cultivate a "troop" of organic intellectuals, adopting the so-called "war of position" in the civil society for the purpose of influencing the value systems of the mass, articulating the needs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obtaining active consent of the people, building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of communist parties.

Gramsci's theory is not perfect. He overemphasized the function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to such an extent that he found himself trapped in an ambivalent idealist tendency. The proposal of "war of positions" is simplified and idealized. Moreover, pinning the hope of revolution on so-called "organic intellectuals" signifies an elitist way of thinking. In the modern age,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war of positions" is more about instructing a ruling party how to maintain its cultural leadership. Hoping for a non-ruling party to obtain leadership by war of position is no longer of much validity.

In general, Gramsci's thoughts on cultural hegemony are still a great inno-

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He soberly criticized the mainstream mechanical materialist tendency in the 1930's and commenced the research on ideology by Western Marxists, hence enjoying a unique historical stat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Firstly, his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eadership and power had mad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more three – dimensional and complete, marking the starting – point of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culture by Western Marxists. Secondly, Gramsci rightfully acknowledged the constructive materialistic function of ideology, subverting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conception of the false and deceptive nature of ideology. His theory had enlightened communist parties to purposefully build their own ideological discourse, serving to link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Thirdly, Gramsci sensitively caught the fundamental extension of capitalist State power structure to the civil society. He in time revised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acknowledging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Civil Society and “war of positions” to hegemony. Fourthly, Gramsci’s theory on “organic intellectuals” link the cross – class identity chain of “the working class–the professional elites–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rts–organic intellectuals”, tracing the origin of intellectual hegemony to the real world of production. Lastly, Gramsci had widened the applicability of cultural hegemony theory to the power structur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showing the down–to–earth and courageous spirit of a real Marxist, making a decisive break from so–called “orthodox Marxism”. His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hegemony struc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had brought profound insights to Marxists of later days, preventing proletariats to wait blindly for a predestined revolution, calling on people to look for a more realistic path of gaining hegemony from inside the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gemony requires the systemic support of economic hegemony, political hegemony, military hegemony and discourse hegemony. If cultural hegemony is compared to a living organism, then economic hegemony shall function metaphorically as its circulatory system, political hegemo-

ny as the nervous system, military hegemony as the skeleton system and discourse hegemony as the respiratory system. Out of these four types of hegemonies, the particular research interest of this thesis concentrates on the construction routes of discourse hegemony.

After Gramsci, Juergen Habermas had attempted to reach the rule of fair law, social solidarity and social consensus by procedural deliberation and negotiative discourse. However, his discourse ethics follows a closed and self-circulating chain of “reason—moral consensus—intersubjectivity—justice discourse—communicative reason—social norms”, characterized by an over-optimistic expectation of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Moreover, a hidden elitist view could be detected in his theory which likewise failed to account for the discourse qualification dilemma of the underprivileged social classes.

Similarly, Laclau and Mouffe also regarded discourse as 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of cultivating proletariat hegemony. To them,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al hegemony is a process of developing “discourse equivalent chains” in open space. As floating signifiers, discourse symbols create merging space for the expansion of discourse sites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discourse, serving as the universalizing prerequisite of articulating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ds of the left-wing political parties. However, by their criticism of essentialism, Laclau and Mouffe completely erased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classes and the function of economic factors, exaggerating the constructive functions of discourse, misunderstanding the thoughts of Gramsci.

This book hence proposes an innovative WWWH discourse hegemony theory, advocating the “Who, What, Where and How” as four dimensions of a discourse route for constructing cultural leadership. “Who” is about the recognition of various discourse subjects in a given society, with the leading bloc as an abstract subject, the organic intellectuals as boundary guardians and the mass who need discourse qualification and discourse motivation to be truly participative. The so-called “What” dimension is about the content of discourse, which var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iscourse subjects. The leading bloc’s discourse con-

tent is dichotomized into domestic policy discourse and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Organic intellectuals' discourse contents also v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udiences. The contents of mass discourse should mainly consist of expression, protest, supervision and freedom of regime choice. "Where" refers to discourse sites, including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discourse sites. "How" is about the adoption of effective discourse strategy. The leading bloc is advised to use "dialogic contraction" and "dialogic expansion" while organic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 are advised to adopt rhetorical devices such as simile, metaphor, pun and euphemism.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WWWH discourse leadership theory, this book compares the cases of "non-interference" discourse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neutrality" discourse of Swiss government. Results are the contents of Chinese government "non-interference" discourse lack sufficient descrip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hidden rules". As of discourse subjec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able to maintain its abstract subjectivity and discourse coherence, but Chinese organic intellectuals haven't been able to implement their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ubjects because of language proble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arted to spend efforts on cultivating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ites, bu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the aspect of discourse strategy,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dialogic contraction" extensively, but rarely touching on "dialogic expansion". It uses "we, our, they, them" substantively but neglects the usage of first and second person singular pronouns to shorten communication gap. Because of the above-mentioned deficiencies i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WWWH theo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leadership is barely established. It needs to mend the above-mentioned deficiencies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leadership.

Regarding discourse contents, the "neutrality" discourse of Swiss government reflects a ruptur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ecretive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Regarding discourse subjects, the Swiss government has maintained